

论反动孔学的历史演变

——批林批孔文集之六

河南人民出版社

论反动孔学的历史演变
——批林批孔文集之六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0册

统一书号 3105·227 定价 0.20元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目 录

论反动孔学的历史演变……………潘 颐 (1)

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把孔老二

越捧越高? ……………青 山 (23)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田 力 (40)

两条路线两部书

——对照起来读《韩非子》和《吕氏春秋》

……………何诗元 (56)

《吕氏春秋》是对商鞅变法的反动……………史 众 (68)

吕不韦的反动一生

……复旦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 晋海生 李业平 俞景玮 (81)

评韩信……………湖南师范学院 羊春秋 周作汉 (94)

论反动孔学的历史演变

潘 瓿

历代的反动派都是尊孔的。孔学作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武器，历时两千多年之久，虽然其反动本质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形势的改变，各个时期的孔教徒为了适应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总是不断赋予孔学以“新”的形式，以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它愚弄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反动作用。因此，孔学在历史上演变的过程，正是反动阶级在没落过程中不断挣扎的表现，而孔学的每一演变都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早在二十年代就曾说过：“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是一个很“可以研究”的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以往孔孟之徒的衣钵，在“坚信马列”的幌子下，兜售孔孟之道，千方百计地使之和他的“无所不为”的反革命阴谋“相宜”，借

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鲁迅所提出的问题就更值得我们研究了。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研究一下孔学在历史上的演变，可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及其反革命伎俩，认清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而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一 两汉时代孔学变为黷纬神学

孔学原是先秦时代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体系，在当时曾被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革命所扫荡，被以法家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所否定，被斥为“虱”、“妖言”、“愚诬之学”；而其开创者孔丘及其门徒则被斥为“盗丘”、“巧伪人”、“丧家之狗”和“蠹虫”。因而继秦以后的西汉时代，自“不好儒”的高帝到以“霸王道杂之”的宣帝，主要的还是推行法家的进步路线。但是，在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的不断发展和激化，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越来越厉害，地主阶级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同时，由于封建制经济基础已经稳定而且获得了相当

的发展，因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反对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尤其是豪族大地主成为最保守、最反动的势力。法家思想已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弃。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在用暴力镇压农民革命和打击进步势力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所谓“德教”的欺骗手段，来进行思想统治。而孔学就是他们用以“德教”的主要内容。因此，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就打起尊儒反法的旗号，竭力排斥法家的进步学说，大肆鼓吹孔孟之道。

在西汉，为了使孔学这种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变得与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相宜”，董仲舒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口号，将孔孟之道加以改造，大肆发挥，使之成为一种更加神学化的形态。他一方面诬蔑法家学说是什么“造伪饰诈，趣利无耻”的“异端”“邪说”；他另一方面为了赋予孔学以神圣化的权威，把孔丘吹捧为“法天而立道”的“素王”，把孔孟之道颂扬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把孔孟的“天命论”、“天人合一”论和先秦时代唯心主义的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成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君权神授”，封建制度乃是“天”（上帝）的意志的安排，神圣不可侵犯。他把孔孟的“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的谬论，炮制成适合于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把孔孟的“中庸之道”发挥为“天道无二”（否认对立、矛盾），从而形成一套“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借以把封建制度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神圣机构。他把孔孟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以及“性善论”，炮制成“性三品说”，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上等的统治者是“圣人之性”，是秉承天意而教化万民的“上智”，“中民之性”不过是普通人而已，而下等的劳动人民则是“斗筭之性”，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下愚”，永远只能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隶，等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人们只能服从，不可抗拒；否则，必受“天”的惩罚。至东汉，董仲舒的这种孔教神学，还变得更加荒唐，成为“谶纬”神学。在汉章帝所“钦定”的《白虎通义》中，孔教徒以“谶纬”的形式，将儒家经籍全面地作了牵强附会的神学解释，甚至编造了孔丘承天之意“为汉立法”的迷信故事，把孔丘吹捧为通天教主，胡说什么孔丘跪受天书，早就预言“卯金刀”即“刘”氏必将得天下；并说《论语》、《孝经》乃是为汉“专制正法”的神圣之作，等等。总之，到东汉，孔学变成极端荒唐的谶

纬神学。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对付农民革命，维护其反动统治用来麻痹人们思想的精神鸦片。

但是，有尊孔，必有反孔。汉代的这种孔教神学，就曾受到当时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和无神论者王充等的严厉批判。在西汉，桑弘羊就曾痛斥孔老二是一个顽固不化、贪愚无耻之徒，而追随孔丘的“七十子”也个个是“不耕而食”、徒乱天下的害人虫；至于孟轲，则是“不知世务”、到处碰壁的“腐儒”。他尖锐地指出孔学乃是“当世之所患”，只有害处，毫无用处。在东汉，王充大胆地进行了伐孔、刺孟的斗争，他以“疾虚妄”的战斗之笔，全面地批驳了董仲舒以来的神学世界观，发展了法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特别是当时的农民革命给了以谶纬神学形态出现的孔学以沉重的打击；到黄巾起义，就把腐朽的汉封建王朝摧毁了。

二 魏晋时代孔学的玄学化

在魏晋时代，不仅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十分激烈，而且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极为尖锐，如当权的门阀士族大地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门阀士族大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的斗争，都很残

酷。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鉴于汉代孔教神学遭到当时进步势力、特别是农民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那种统治和麻痹劳动人民的作用，因而不得不采用先秦时代的老、庄思想；但是并不排斥孔学。如魏文帝曹丕的首次诏书就颂扬孔丘是“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晋司马炎做了皇帝以后则力倡“以孝治天下”。鲁迅曾指出：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曹魏的王位篡夺于汉，晋司马氏的王位篡夺于曹魏；篡夺王位是不符合于孔教“忠君”的原则的，所以魏晋“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也是“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

但是，这时的孔学却是以玄学化的形态出现的。所谓玄学，是把儒道合一，中心思想是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说成合乎自然的，把儒家的名教同道家的自然结合起来。它是依据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等炮制出来的，为当时门阀士族大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作辩护的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体系。当时的玄学家如王弼、何晏等在大肆鼓吹老、庄思想的同时，就是把孔学加以玄学化，即把

儒、道合而为一的。例如王弼、何晏都推尊孔丘为“圣人”，甚至“皆云老（老聃〔dān，音丹〕）不及圣（指孔丘）”，把孔丘抬高到老聃之上，借以宣扬儒家名教即“三纲五常”之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玄学家认为“道”即“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一切都是“无为”之“道”这个精神本体所派生和支配的，因此，人们只有笃守“无为”这个根本，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而免受灾祸。王弼说：“圣人体无”——孔丘这个“圣人”就是“无”即“道”的体现或化身。这样，在他看来，孔学岂不是至高无上的“道”或“真理”了吗？所以，玄学家宣称：“名教本乎自然（‘道’）。”这就是说儒家名教都是“天道”的神圣产物，因而这也就把“三纲五常”等封建制度都说成是天然合理、永恒不变的东西了。同时，玄学家认为“道”是“贞一无二”的，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对立、矛盾的，因此，人们只有“居中履和”才符合“道”的精神，这与孔孟的“中庸之道”完全一致。玄学家还说：“言物各有分（定分），故智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这正是孔丘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翻版。不仅如此，玄学的奠基者王弼以及何晏还直接把儒家的主要经典《论语》加以注解，即把孔学

加以玄学化的解释；并把他们的反动学说美其名曰“新学”。这些都说明魏晋时代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学加以玄学化，是为了使孔学更圆滑，更具欺骗性。在他们看来，以玄学化的“新”形式来宣扬孔孟之道，禁锢人民的头脑，维护封建统治，比之汉代的孔教神学来是更有效的。

然而，这种玄学化的孔学也是欺骗不了革命者和进步的人们的。当时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以及唯物主义者如裴颢（wěi 音伟）、欧阳建、杨泉等对于玄学的批判，就有力地冲击了这种“新”形式的孔学。所以后来这种玄学化的孔学也就逐渐衰亡了。

三 唐代所谓“圣人”传道的“道统”说

到了唐代，李家世袭王朝的封建统治者，曾推尊老聃为他们李氏之祖（相传老聃姓李），借以鼓吹道家思想；同时也很重视佛教和儒家反动思想的统治作用，因而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是同时使用儒、道、佛这三种思想武器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孔学仍占重要的地位。唐代的封建统治者曾认为“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对于维护封建王朝“如鸟有翼，如鱼依水，

失之必死，不可暂无”，甚至把孔丘尊为“文宣王”，并将孔门弟子追封为“公”、“侯”、“伯”。当时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尤其是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曾引起儒、道、佛三教的辩论，各自称长，互不相下。同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如顺宗时保守派宦官俱文珍集团与革新派王叔文、王伾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曾引起思想领域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就在上述这种斗争中站在世俗大地主阶级立场的韩愈和李翱[áo，音熬]，打起尊儒反法的旗号，他们为了阐明孔学乃是维护封建统治最有效的精神武器，借以排斥佛、老，为孔学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与僧侣地主阶级争权夺利；为了复古，反对当时以王叔文等为代表的企图在封建制度范围内进行的革新运动，而编造了所谓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说。

虽然韩愈在《石鼓歌》中也曾说了“孔子西行不到秦，捋髭星宿遗羲娥”的话，开了一下孔丘的玩笑，并在文学上有些成就。但是他认为孔孟之道是遼[suì，音碎]古以来就有的，原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丘一直传到孟轲；而至孟轲死，就“不得其传”了，并咒骂大法家秦始皇破坏了

三代奴隶社会的“纲纪”，“灭先王之法”“天下遂大乱”；同时又鼓吹什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认为人类历史就是象孔丘、孟轲这样的“圣人”所创造的，否则，人类早就灭亡了。李翱则说“中庸”之道由孔丘传至子思、孟轲及其门人公孙丑、万章之后，“遭秦灭书”，“此道废缺”，也就失传了。同时宣称：“道之极于剥也必复。”认为孔孟之道是永恒的真理，必然会有“圣人”“复生”将它加以恢复和相传下去的。因而他们互相吹捧：李翱吹捧韩愈是孟轲死后“不见有过于斯者”的“圣人”；韩愈则吹捧李翱“可谓究极圣人之奥矣”，而且别有用心地兜售孟轲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谬论，认为“圣人不世出，贤人不时出，千百岁之间傥有也”。他们彼此吹捧为“圣人”“复生”，那末孔孟之道“必复”，而其“复”的重任，就落在他们两人的身上了。

于是，他们就以天生“传道”为己任的“圣人”自居，大肆鼓吹孔孟之道，并竭力使之与当时的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相宜”，说什么封建统治阶级之为“贵”、“福”、“智”，劳动人民之为“贱”、“祸”、“愚”，都是“天”（上帝）的规定；统治阶级是最讲“仁义”的，劳动人民不必反对统治者；

即使受剥削以致饥饿至死，也要“忘嗜欲”，“无思无虑”地进行修心养性，就会得救，否则，起来“交争”，“天”就会来惩罚，那是很“不祥”的。……总之，韩、李所鼓吹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封建主义之“道”的合理性。韩愈把这个“道”的具体内容概括地表述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不过是孟轲所谓“天下之通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具体化而已。韩愈还恫吓人民说：如果劳动人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供奉统治者，就得杀头。因为这个“道”是天生“圣人者立”，是体现上帝的意志的，是神圣不可违反的。

显然，韩愈和李翱所鼓吹的谬论与汉代谶纬神学和魏晋玄学化的孔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是他们却说是由于孔学失传了，才把它们复原起来的“真理”。韩愈曾说只有他所鼓吹的“道”才是“原道”，是孔孟之道的真传；李翱也自我吹嘘说：“吾之所知而传”之“道”乃是“开诚明之源”，就是孔丘“复生”“不废吾言矣”。在他们看来，似乎自汉以来的孔教徒所鼓吹的孔孟之道都是不足道的假货。其实，所谓“圣人”传道的“道统”，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一套唯

心主义的骗人鬼话。

然而，韩愈、李翱这种孔学唯心主义，尤其是“天命论”，受到当时具有反儒尊法精神的唯物主义者柳宗元以及刘禹锡等人的有力批判；柳宗元就曾明确指出“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对于现在社会是无益而没有用处的，而且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不是由“圣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时势自身发展的结果，反对“师古训”、“荣古虐今”，主张社会革新。柳宗元与韩愈相反，给秦始皇以很高的评价，并说“申商刑名”之说即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皆有益于世。尤其是柳宗元、刘禹锡在《天对》、《天论》等著作中继承了荀况、王充等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给韩愈之流的唯心主义天命论以沉重打击，他们指出，鼓吹“天命”，无异于“淫巫瞽[gǔ，音鼓]史”之言，是极端荒唐的。此外，唐代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提出“冲天”、“平均”的革命口号，给了韩、李所鼓吹的封建主义之“道”以更沉重的打击。因此，后来的孔教徒也就不得不改变骗术，而采取另一种“新”的形态来鼓吹孔学了。

四 宋明时代以孔学为核心的理学

宋明时代，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后期。当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农民革命风起云涌；同时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因此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如在北宋就出现了地主阶级内部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在南宋则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形势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除了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之外，还把它们的思想武器——儒、道、佛三教糅合起来，但仍然“以儒为统”，即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炮制了一大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学，使孔孟之道更哲理化，更诡诈圆滑，更富于欺骗性，因而后来的封建阶级，如清朝统治者以及近代反动派，也都以宋明理学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为了使孔学更神圣、更有权威性，宋明时代的封建统治者给孔丘以“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等可怕的头衔，甚至还想封之为“帝”。而一帮御用文人——理学家如程（颢、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则竭力把孔孟之道变得与封建统治更加“相宜”。二程还大要韩愈、李翱之流所